

模糊叙事: 明清长篇小说对世界的一种认识

韩 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模糊叙事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等长篇小说的一种表现形式。模糊叙事达到的效果是: 人物性格失去了清晰的类别属性; 人物行为的性质也无法简单判定, 特别是道德评判难以进行; 由于视角的限制, 人物生活世界的真相变得含混不清或者不可知。模糊叙事的这些形态体现了小说艺术对复杂世界的独特认识和把握。

关键词: 明清长篇小说; 模糊叙事; 不确定; 世界的模糊性; 形式

在人类不同的智识类型中, 有两种类型对照鲜明, 一类看到的是清晰、绝对、确定、逻辑的世界; 另一类看到的却是模糊、相对、不确定, 矛盾的世界。同时这也分别对应着两种头脑类型。前者, 占据绝对强势; 后者, 往往遭到忽视。20世纪60年代, 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查德(L. A. Zadeh)说: “模糊、暧昧以及不精确, 一般地说是贬义词。当我们谈到精确、逻辑以及清晰时, 都充满敬意, 而对缺乏数学训练或者模糊的推理则感到蔑视。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人类的认识过程, 我们将发现人类能运用模糊概念是一个巨大的财富而不是负担。”^{[1](P67)}事实上, 在“清晰派”处于中心地位的传统里, 处于边缘的模糊性智慧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不仅科学领域如此, 人文、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就小说艺术而言, 更是如此。西方的一些小说理论甚至将模糊视作小说的艺术本质。

具体到我国古典小说来说, 《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

史》和《海上花列传》等长篇小说对世界的模糊性的发现以及表现, 构成了小说艺术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这些小说中的模糊叙事, 概括说来, 就是人物性格诸因素由于类属的界限不清晰而难以类属化, 与此同时复杂的个性得到了突出; 人物的行为性质不确定, 或者前后矛盾, 无法给予单一明确的评价, 特别是道德评判难以进行, 人的行为成为了理解的对象; 由于视角的限制, 生活世界的某些层面变得含混不清或者不可知。这些特征, 尤其比较普遍地体现在上述以日常生活为描写中心的写实小说中。

—

小说写人, 不单是艺术塑造的问题, 它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小说家对人和世界的认识。多数古典小说认识人的性格, 总是追求分明的类属特征, 即用单一、清晰的现实观念或者既定的道德概念

收稿日期: 2004-07-03

作者简介: 韩石(1966-), 男, 宁夏固原人,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来图解或者拼合人的形象。这可以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因为古代、近代的结束而成为过去,究其原因相当复杂,因此,直到当代中国,理论界还在进行着探索。比如对立两极性格组合论的提出,就是试图改变中国文学对人的复杂性的忽视。^[2]而另一方面,近世中国的小说,特别是出色的作品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即对人的认识逐步走向深刻复杂。这体现在许多方面,模糊叙事正是其中之一。在模糊性叙事中,性格的类属界线变得难以确定。模糊性格以摇曳不定、闪烁变幻的复杂整体呈现出来,无定与确定、朦胧与明晰、熟悉与陌生相互交织纠缠,困扰而吸引人的认识,使人困惑不解却又欲罢不能。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模糊性格虽不算多,但很值得注意。

让我们来看具体的作品。张竹坡认为《金瓶梅》写吴月娘“不作一显笔”。^{[3](P2《读法》)}这说明评点家也认识到了这种模糊手法。其二十一回,写月娘夜里烧香,望空祈祷,保佑西门庆早早回心,妻妾中早见嗣息。正好被西门庆回来听见,西门庆又惭愧又感动,作揖下跪,求月娘原谅自己的过错。事情本来非常清楚,但经潘金莲和孟玉楼背地里一议论,此事就变得十分蹊跷。金莲说:“一个烧夜香,只该默默祷祝,谁家一径倡扬?使汉子知道了,有这个道理来?”月娘烧夜香到底是诚心诚意呢?还是为了做给西门庆看?张竹坡说“吾欲定其真伪”,“乃翻卷靡日,不得其故”。但最终从一些蛛丝马迹,认定“烧香为王姑所授之计”,为的是挟制西门庆。^{[3](二十一回回评)}但这毕竟是批评家外位的看法,究竟如何,还是不确定的。联系整个小说,月娘的性格写得最为含蓄,她的内心世界的确是这部小说中最为复杂的。她对李瓶儿的病情相当关心,瓶儿死了她也显得挺哀伤,但看到西门庆宠爱李瓶儿、悲悼李瓶儿就本能地气恼万分。以至于她在李瓶儿一咽气,发泄的不满比潘金莲还多。她对待李瓶儿的态度,始终忽冷忽热,令人捉摸不透。如果说潘金莲体现的是分明的性格,那么吴月娘则完全是她的反面。

由吴月娘自然想到刘备和宋江。鲁迅说《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4](P129)}从艺术表现的分寸感而言,的确如此。但对刘备这个人物而言,更多的地方,

长厚和虚伪就构成了一个模糊集。小说家在“拥刘”的同时,并不排除对刘备这个“枭雄”性格中那些深不可测的复杂因素进行动态把握的可能。小说家如果仅仅单方面成功地显示了刘备的长厚或者虚伪,作为一代“枭雄”就可能缺乏应有的深度。刘备的个性就绝没有像现在这样耐人寻味,令读者猜测不已。

《红楼梦》中人物生活里的模糊因素更为普遍。人物的感情在这部小说里变得空前丰富和复杂。其复杂和丰富,很大程度上是模糊叙事所导致的。同时代的评点家就颇能领会小说家的这种眼光。庚辰本第十九回脂批说宝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5](P969)}不仅宝、黛如此,几乎主要人物都存在这一因素。像薛宝钗,随处施惠于人。她往往能体察别人体察不到的东西,因此很稳当地使湘云、黛玉、邢岫烟、袭人心服于她。她的行为和品德很难界定,说她内藏奸诈,太辜负了她一片好心;说她大有深心,似乎处处都显得纯净自然;说她纯粹出于热情,她似乎又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

《儒林外史》的人物,其个性往往很难评价得恰到好处,原因之一就在于许多人物都突破了善恶分明的两极判断。小说在把握人物性格时扬弃了那些为一般小说所不免的概念式的、脸谱化的清晰和绝对性质,进入了模糊复杂的鲜活境界。试举一例。杜慎卿,很难用二重性格来衡量其个性。他处处自命不凡自高位置,但又非吹牛扯谎。他十分擅长风雅生活,每每出人意表,真正能领略生活的诗意。他说斗方名士玩的一套“雅得这样俗”;讨厌人“开口就是纱帽”。他绝少同情弱者和失败者,缺少道德热情;极端精明,损人以助人;自伤自恋,几近病态。他称自己“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子就闻见他的臭气”,却急急娶妾;他别出心裁品第花案,不知好色还是好名。这是一种新的复杂性格,没有什么现成的标准能确定那些方方面面的表现。当我们说似乎“属于”的时候,它们

又似乎“不属于”,而当我们说似乎“不属于”的时候,它们又似乎“属于”。这些性格因素就在“属于”到“不属于”之间来回流动,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自然不能刻舟以求剑。

这种模糊性格,在西方文学中人数众多。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要数诞生于16世纪末的堂吉诃德。“他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性格,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最初,被看作“疯癫可笑的骑士”。逐渐人们认识到他是一个“讽刺者”,“可笑而又可爱”。随后又产生出种种认识,有说他是“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有说他是“严肃的道德家,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有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叫人失笑,又叫人下泪”。^{[6](P2-7)}种种歧见,不胜列举。杨绛说:“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活人,不易看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对堂吉诃德正也如此。”^{[6](P12)}因此,米兰·昆德拉提醒人们注意:“塞万提斯使我们把世界理解为一种模糊。”^{[15](P5)}小说家对人及其世界的独到表现,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审美过程中受到心智的启蒙,这是小说对文明的伟大贡献。

二

在模糊叙事中,人物行为的性质将难以确定,甚至相互矛盾,伦理评价无所适从。

即使在《三国演义》这部伦理倾向相对明确的小说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史书并无记载,就小说而言,这是一次改变了三国历史进程的个人行为,关系重大。毛宗岗则认为关羽“恩怨分明”,“虽其人之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此在无义气丈夫则然,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使关公当日以公义灭私恩,曰:‘吾为朝廷斩贼,吾为朝廷除凶。’其谁曰不宜?而公之心以为他人杀之则义,独我杀之则不义,故宁死而有所不忍耳”。^{[7](第五十回回评)}尊重个人感情的选择,这也许正是关羽之为关羽的地方。但是,这样的“义举”本身包含着无法回避的矛盾:对曹操的义同时就隐含着对刘备的不义。而对曹操的义,进一步说既是对敌人的义又是对恩人的义;而

对刘备的不义,可以说是对义兄或者君主的不忠及对孙刘联合行动的背叛。这实际上潜藏着两种道德。人生的许多抉择,虽然都可以从明确的原则、绝对的道理去评判,但是对做出选择的具体的人来说,无疑是考验是煎熬。艺术展现了人物无可避免地身陷两难境地,这正是其动人之处。

《儒林外史》对行为性质的模糊性表现得更加多样。它的很多人物,如娄氏兄弟、杜少卿、杜慎卿、虞博士、余特、余持、沈琼枝等,在具体生活中,其行为很难把握,其行为已经无法以现成的伦理标准去衡量。当沈琼枝发觉自己为盐商所骗,买做小妾,那一连串颇具传奇色彩的行动就很值得一提。在盐商家的一处幽静清雅的小院落“消遣”了几日后,便“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环,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评论家众说纷纭,天目山樵说:“谬不可言。是鲁智深二龙山(应作“桃花山”——引者注)手笔。”^{[8](第四十回)}又说:“观其作为似乎动听,而实无谓。”卧闲草堂评曰:“琼枝,亦豪杰也。”^{[8](第四十回)}齐省堂评道:“而此写得生龙活虎,不可捉摸。”^{[8](第四十一回)}“不可捉摸”正是对人物行为的准确感受。是对是错,是俗人是女杰,是中国娜拉还是女鲁达,有意义无意义,恐怕很难准确界定?人物新异、流动、眩目的色彩,永远使人物行为的性质处于不确定之中。

再如,鲍文卿父子受向鼎委托,考童生时在察院里巡场查号,反替作弊者遮掩(第二十六回)。国子监考试,虞博士监考,作弊者撞在他手上,他不仅保护了作弊者,还把夹带悄悄递给那人,说:“你拿去写。但是你方才上堂不该夹在卷子里拿来。幸得是我看见,若是别人看见,怎了?”过后那人来谢,虞博士不承认有过此事。据杜少卿透露,虞博士平日好做这类事(第三十七回)。这一方面说明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是贴近世俗人情来理解道德准则,包括在这些正直之士的心目中。正如章培恒在分析该小说中的道德观时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以一种被传统的道德观念断定为不道德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也是值得同情而给予帮助的。在这里,传统的道德观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就消失了。”^{[9](P12)}另一方面,也说明小说没有将它肯定的人物变成极端完

善的道德的化身。但是这样以来,人物的行为究竟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呢?是合情符合道德还是合理符合道德?有人说莎士比亚的主要人物往往“引起我们从道德方面对他们不断地猜测,也许他们就是为此目的而创造的”。因为“莎士比亚认为诗人的任务是展示而不是审判道德行为”。^{[10](P220-221)} 吴敬梓和他的人物与此十分类似。

在道德探索上,古典小说大多都持清晰确定的道德判断。像《儒林外史》这样的做法,使它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布斯所说的“不打算提供任何趋向于结论或最终说明的小说”。^①但这并不意味着《儒林外史》等小说在道德判断上所具有的模糊性会将个人行为的性质推向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义。而只不过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将道德判断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这种道德与人类无法根除的行为相对立,这种行为便是:迫不及待地、不断地对所有人进行判断,先行判断而不求理解。这种随时准备进行判断的热忱态度,从小说的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恨的傻,是最害人的恶。小说家并不是绝对地反对道德判断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逐出小说之外。”^{[11](P6)}

三

由于视角的限制,生活世界的某些层面变得含混不清或者不可知,留下广阔的空间,供人意会。小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现神秘。以往公案小说喜欢制造神秘,但这种神秘实际上只是悬念而已,真相总会大白。这里所说的神秘不是这种悬念式的神秘,而是像戴维·洛奇所说的,“往往在神秘中掺入一些不明确的东西,而且始终不揭开这些神秘。”^{[12](P34)}但是“不明确”的性质不应该理解为是附加的东西,可有可无。模糊性是我们感知到的许多对象的固有样态或属性。它无法被消灭,也无法被清晰和确定简单加以替代。

《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龙三来闹僧官的这段描写,其形式是值得注意的。人物对话非常完整,场面没有缺省,但是,龙三与僧官到底是什么关系?龙三与金东崖又是什么关系?龙三为什么能挟制僧官却害怕金东崖?龙三先前如何拐了金

的银子逃走?金见了龙三为什么不追究?龙三的出场,是不是可以看作僧官和金东崖这两个形象的一个部分?种种疑问反而因为描写产生出来,但小说在此放弃全知的叙述,进入模糊和不确定之中。因此,生活描写在此是一个虚实整体。一半是留给“可视的”,一半是留给“可思的”;往往实有的文字很有限,而富有意义的空白却非常广袤。

《红楼梦》中神秘的、不透明的地方很多。像秦可卿一类人物,给人感觉是没有写出来的远比写出来的要丰富复杂,故而,被人一猜再猜。薛宝钗到底有多“奸诈”?她所做的一切,其动机究竟为何?小说常常使读者身陷疑阵之中。以黛玉之敏感,都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判断,从心底里敬爱宝钗,这就让人感到错会了宝钗。可实际上宝钗始终是看不透说不清的。《红楼梦》中有时一二句话,也让人颇费思量,比如晴雯在临死前对宝玉所说的那些追悔的话,给理解晴雯留下一个模糊的空间,这种模糊一直延伸到后四十回。焦大的醉骂句句分明,可落到实处却很含糊。“性”在《红楼梦》里被推向一个模糊的角落,像宝玉性爱的问题,小说基本上采取了暗示的方法。戴维·洛奇也说:“暗示在对性行为问题的处理上是一种尤其有用的方法。”^{[12](P210)}“这最好是猜到的,而不是描述出来的。”^{[12](P212)}这是《红楼梦》一个成功的尝试,真正超越了《金瓶梅》等小说的“窥视”和“偷听”。这一经验就为后来的《海上花列传》所借鉴。

《海上花列传》对隐秘的表现,是该小说对模糊手法的发展。《海上花列传》在结构和叙事上常常追求一种隐秘的效果。在结构上造成的这种效果,是由于小说的情节组织贯穿了小说家所谓的“藏闪”的方法。这个问题,本文不做讨论。我们要谈的是叙事的隐秘效果。小说在对生活世界进行描写的时候,常常使生活世界具有二重现实,即写出的表象和未写出的真相。这种叙事的隐秘与结构上的隐秘不同,就是说,后者是一种暂时的隐秘,随着情节的进展,这种隐秘是要逐渐被揭示出来的,最终会“全体尽露”,真相大白。而叙事的隐秘可以说永远不会消除,它具有种种可能,供人想象。

人的所有那些不愿为他人所知的内心世界在

小说中都显得神秘莫测。举例来说,第三回,老鸨周兰新买回一个雏妓,便引出周兰、洪善卿、周双珠、巧因之间的一番闲谈。表面上看,这些日常对话再平淡不过,评价新来的讨人,谈及周双珠嫁人,请洪善卿给讨人起名。但细读,描写的背后又似乎存在着不同的内在世界:周兰有可能借机试探善卿和双珠的关系;洪善卿给新信人起名“双玉”,意味着他的相好双珠永远只能是公阳里“双字辈”的招牌,他并不在意她将来归宿;双珠只能笑着抢白巧因以遮掩灰冷绝望的心情。因此善卿走时,“双珠起身,待送不送的”,只嘱咐了一句信人送熟客时的套话。但是这也只是一种理解。小说的这些叙述描写让读者的理解永远处于飘摇不定的状态,说不定我们的想当然就根本是无中生有,也许我们稍不留神就会受到人物的欺蒙。一般小说中的解释性描写是为了使事情更清楚,但在《海上花列传》中却不尽然,有时愈解释愈不透明,反倒协助了隐秘的效果。

不仅人的内心世界是隐秘的,而且私人生活有很大的部分都成了秘密。像那些三角关系,我们和其中某些人物一样,可能毫不知情。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黄翠凤与客人钱子刚的交情,她赎身、调头时玩的把戏,我们可能和罗子富一样被蒙在鼓里。她究竟是如何与黄二姐合谋偷走罗子富的拜匣后又进行敲诈的?这些有相当的部分都不得而知。周双玉和朱淑人反目后,寻求解决的办法,“善卿手招双珠,并坐一边高椅上,搭间附耳,密密长谈。双珠从头至尾,无不领悟”。然后你来我往进双玉房中与双玉商量。在场的朱淑人和书外的读者都不知道具体说些什么。将人物隐秘的动机、活动照样加以隐秘地描写,这种人物其个性也得从这种描写形式中获得理解。

作者在《海上花列传例言》里说:“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间,令人意会。”其中有些,诚如作者所说的“直须阅至数十回方能明白”。但是这种“明白”并不等于二重现实不再存在,而是像帷幕的一角被风掀起随即又落下,人们似乎看到了什么,但又满心疑惑。

四

我们可以从现实的经验来理解小说的经验,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所谓真实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有人说:“真相就如同一封信,一封寄给我们的信,而我们却将它置之一旁,不去打开。”^{[13](P10)}但是,是不是当我们打开来,真相就已经等在那里呢?真相包含着种种模糊的不确定因素,即使在信息十分发达便利的今天,我们对某些事件的把握也很难保证绝对确定清晰。有些事件,甚至当事人所知亦各不相同。只要想想我们同时代的国际间的事件,或者我们周围人的生活,谁焉能全知底细并确定无疑?对于人,“认识你自己”和理解他人,恐怕永远是人类的难题。我们都“是在雾中前行的人”,大概谁也无法例外。我们可能全知全能,但至今还没有,也无法否认我们认识的局限性,也不能不承认无定的、模糊性的存在。我们应当承认世界远比所能把握的更为复杂丰富。我们已知的不过是冰山的峰尖,而未知的可能要大得多,要限制可以无限全知的错觉。人应当敬畏在我们的既定规范和价值成见所无力统治的那个模糊世界。正是在可把握的世界的疆域之外的那些模糊天地,引导拓展修正人看待世界的目光。

因此,列夫·托尔斯泰等人认为,“凡发生之事,都是一张张网,由事件、对象及特征结成,厚厚纠缠、密不透光、复杂难解,既以无数无法辨指的环节相互系扣而成,又由无数有形无形的间隙与突断为之区分界隔。这种现实观,使一切清晰、逻辑与科学的建构——人类理性所获知的轮廓精详、匀称均齐样式——显得滑巧、单薄、空洞、‘抽象’,若取以描述或分析任何有生命、或者任何曾有生命之物,完全无效。”^{[14](P81)}“数目浩瀚的事物交互关系——事件的细微决定原因,我们所不知者太多;我们若但稍知因果之网变化无限,便应停止称赞与责备、夸言与悔吝,或者不再将人视为英雄或恶棍,而怀抱适当的谦抑,虚心伏首于无可避免的必然性之前。……我们若以太少的证据作成结论,将是自陷于可笑。”^{[14](P83)}相形之下,倒是这些小说善于体察世界的繁复难解,它们在模糊中更加逼近真实。这些小说使我们懂得“人面临的不是一个绝对真理,而是一堆相对的互为对立

的真理,因而唯一具备的把握便是无把握的智慧,这同样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无把握的智慧”也就是“小说的智慧”。^{[15](P5-6)} 阅读小说,如果在娱乐中还有教益的话,那么最大的“教益”就是源自小说本身的这类智慧,而不是道德教化。

注释:

①见 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十章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 [1] L. A. 查德. 模糊集论—展望[J].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1981, (1).
 [2] 刘再复. 性格组合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6.
 [3] 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Z]. 济南:齐鲁书社, 1987.
 [4]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5]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Z].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6] 杨绛. 堂吉珂德译者序[A]. 塞万提斯·堂吉珂德[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7] 增像全图三国演义[M]. 北京:中国书店, 1985.
 [8] 吴敬梓. 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9] 章培恒. 儒林外史中的道德观[A]. 灾枣集[C].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10] 斯图厄特. 莎士比亚的人物和他们的道德观[A].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11] 米兰·昆德拉. 被背叛的遗嘱[M]. 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12] 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
 [13] 黄凤祝、袁志英、维克多·伯尔编. 伯尔文论[C]. 北京:三联书店, 1996.
 [14] 以赛亚·伯林. 俄国思想家[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15] 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M]. 北京:三联出版社, 1992.

Vague Narration: A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in the Novels of the Ming & Qing Dynasties

HAN Shi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Vague narration is one of the forms of expression in such novels as Romance in the Three Kingdoms, All the Men are Brothers, Chin Pin Mei, The Scholar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Flowers of Shanghai. Vague narration can achieve the following effects: the characters lose their distinct attributes; the nature of their behavior cannot be simply judged, and especially their morals can hardly be assessed; limited by the visual angle, the real world of the characters becomes vague or unknown. These forms of vague narration show that the art of novels has its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and good grasp of the sophisticated world.

Key words: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vague narration, uncertainty, vagueness of the world, forms

(责任编辑:卢大中)